

张学良的功过是非

邱霞

[摘要] 近年来，关于张学良的非议颇多，但大多站不住脚。对待历史人物，应按照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从评价标准、评价方法、需要处理好的关系等方面给予公正客观的评判。本文认为，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不管他身上带有多少时代、阶级和个人的局限，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关键词] 西安事变；《申报》；国统区；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28-03

DOI:10.14019/j.cnki.cn31-1856/k.2016.12.010

今年是“西安事变”爆发80周年，它的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结束，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拉开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张学良作为事变的主要组织发动者，一直以来受到尊重，被誉为民族英雄。但是，近年来对张学良的非议日渐增多：从民族大义，到才华能力，再到人品人格，被批得无一不是处，更被说成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本文将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尝试对张学良的功过是非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看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史学界争论颇多。一则争论是否应有统一的标准，二则争论如果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基本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应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历史人物的言行，看其对社会历史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阻碍即否定，促进即肯定。

张学良登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集国仇家恨、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形势十分险恶。南京政府希望他改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而日本人要他实行“自治”，如不听警

告，则日本就要自由行动。经过长达半年的和平谈判，张学良于1928年底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五色旗。“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东北易帜其本身求统一、求抗日的历史趋势，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做出的第一件有深刻影响的大事，是他一生中最令人称道的爱国壮举之一。”^[1]

然而，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不仅使他自己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使我东北大好河山不战而亡，顷刻沦陷。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已经下了不抵抗的禁令。7月的“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反对反日运动，命令“隐忍自重”；8月的“中村事件”，蒋介石铣电称“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求张学良严令东北军，“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对日本寻衅的态度也是不得抵抗。事变后，他判断只是一次和以往一样的寻衅事件，因此“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尽管张学良自始至终强调是自己对局势判断失误，并不是真的不抵抗，只是一种避免战争的策略。但是，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三千万人民处于日本的铁蹄之下，继而日本以东北为基础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这一切张学良无疑负有重大责任。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上升，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当时，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涨，而蒋介石却坚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秋，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到西北“剿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歼灭东北军两个完整精锐师，师长均战死。张学良深有感触，尽管刚刚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斗力依然极强。他更加感到，内战就是内耗，应该及早把各方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由此拉开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国共对抗还要继续，合作遥遥无期，抗日更无希望。事变无疑对推动时局向着有利于抗日图存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张学良功不可没。

二、从历史人物评价法看

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阶级分析法和历史主义原则的结合。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是指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评价，而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历史人物。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即在分析历史人物阶级属性的基础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是由其所处时代和阶级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当然也包括张学良本人。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原有的集权统治垮台，帝国主义对中国继续采取分裂和侵略的政策，而新的强有力的统治还没能建立。武力成为控制权力的首要法宝，中国进入了“有军队就有权力，战争解决一切”的军阀时期。民国时期的军阀在阶级属性上仍然属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一定时期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一方面利用手里掌握的政权和军权，大肆掠夺土地，并以残酷的方式经营土地，加深了农村的危机；另一方面又以出卖国家利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扩充实力，进而建立反动统治，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张学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正值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时期，军阀出身的他自然也不能摆脱他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

皇姑屯事件以后，东北政局陷入日俄夹缝的危

困之中，国民党当局又有“以外交制奉张”的意图，张学良完全可以“挟寇自重”。但是他抵住内外压力，以民族大义为重，选择易帜归顺中央，寄希望国家统一，共同抵御外辱。作为一个军阀他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各派军阀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东北易帜”时间多次推迟，半年内悬而未决，固然有日本势力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也有张学良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力”的主观意愿。易帜时间最后在12月中旬，是因为蒋介石此时才答应了张学良的两条根本要求，即热河划归东三省及各省人事维持现状。张学良决定易帜的关键是蒋介石的全面让步，从而保证他的军事实力和在东北的权力。有学者甚至提出，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3]这种观点虽然过于绝对，但是也说明张学良作为封建军阀，“易帜”有一重目的是谋求个人利益。

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承认是他下的，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无关。但是我们仍然要以历史主义原则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从蒋介石的角度讲，他才是不抵抗的始作俑者，一是因为他才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总代言人，二是由于时局对他的影响。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身是软弱的，强敌当前自然就产生民族失败论，同时又有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心理。因此他想要依赖外部力量，假和谈之名，行妥协退让之实，以保存实力，对内消除异己，巩固强权。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由南京到九江的军舰上，准备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19日，蒋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23日，又命万福麟、鲍文樾带口信：“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4]以蒋在国民党中央以及对张学良的影响力，尽管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他也只能负第二位的责任。

从张学良的角度讲，他一方面迷信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另一方面也有个人的地方主义思想。张学良一直以来对蒋介石都是大力支持的。但是据《蒋介石日记》披露，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初期曾记，“此亦为外交之转机，亦为国家统一之转机”。张学良口述实录认为，前一句话是希望列强干预，归还东北；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日本归还东北，也不必再交给张学良了。^[5]在蒋张关系最好的时候，蒋依然在防范张。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对张学良势力的最大一次削弱：东北军损失数万兵力，空军、兵工厂、大量武器都被日本虏获；张家银行损失达千万元以上，损失黄金四万多两和大

量古董，大帅府的六个金库全被打开；政治上损失更为惨重，张学良本人被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雄踞一方的局面消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虽然“息内争，御外辱”和“全国抗战”是张学良主要的政治主张，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当然也是自保。从环境和阶级的视角出发，无论谁处在张学良的境地，都会选择下令不抵抗。

三、从评价历史人物要处理好的两个关系看

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和历史活动的客观结果之间的关系。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活动时，既要考虑到人物的主观动机，又要考虑到客观结果，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辩证地分析。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的主观原因在于他对局势的错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方针。张学良主观上对日本借事变完全侵占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缺乏认识，一味希望事态不要扩大。张学良曾说：“我这个人胆大妄为的，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真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人拼命的！”^[6]他认为，日本人吞并东北并不是明智之举，日本并不能获利。日本公然入侵中国，对国际社会无法交代，在国际上无法立足。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张学良的认识并没有错。日本打了八年都没能灭亡中国，正是侵华战争拖垮了日本。因此他采取了处理日本挑衅的一贯做法：离开他，躲开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才让张学良看清了日本人的野心和真实意图。因此才有他后来在西北劝说阎锡山抗日，那时候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和日本的事已经化不了了，只能团结一致抵抗，而别无他法。

此外，张学良还有一重顾虑，即东北军没有以一己之力担起捍卫整个民族国家安全的能力，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东北军只有在全国抗战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抗战，因为两军力量相差实在悬殊，而且关东军背后是整个日本的力量。他认为，“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应付”。他提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7]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抗日决心。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

决。”^[8]乞怜国联，坚持不抵抗，这就是蒋介石的态度。在全国抗战的前提下不具备的情况下，张学良只能“期望这次事件，不致于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9]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无论张学良抵不抵抗，都不会改变事变的结局。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不仅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侵华野心，更认识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的固执态度。因此“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对张学良才能“高唱入云，实攻我心”。

二是要处理好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和个人私生活之间的关系。应当以政治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个人性格、生活作风等不应该是肯定或者否定历史人物的尺度。同时，还要注意辨别历史人物个人私生活坊间传闻的真伪。很多人诟病张学良的个人生活，特别是他流连赌场妓院，染有毒瘾。但是，这不能影响我们对他政治活动是非功过的判断。九一八事变后他痛下决心，忍常人不能忍，戒除毒瘾。他虽然风流韵事多，但九一八事变当晚并不像传闻所说沉溺酒色，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事实上，张学良当晚正出席辽西水灾筹款义演，英国大使夫妇等要人在。接到沈阳电话张学良即离席处理，一刻未耽搁。谣言之所以广为传播，是日本和南京方面蓄意为之，目的就是坐实张学良的“风流将军不抵抗”。张学良后来在软禁中和原配夫人于凤至离婚，也并不是世人传闻的和赵四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于凤至在美为张学良被软禁申辩，引起蒋介石不满。迫于政治压力，二人不得不离婚。可见，评价历史人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数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为民族复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管他身上带有多少时代、阶级和个人的局限，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参考文献

- [1]陆军等.张学良——东北军[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527.
- [2]张德良.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J].社会科学辑刊，1991（5）.
- [3]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J].历史研究，2003（2）.
- [4][5][6][7][9]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430.438.425.428.428.
- [8]常铖,饶胜文.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M].山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67.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捷